

德国主流媒体 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认知 ——一项语料库批评话语分析*

李莎莎

摘 要：“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年来，德国主流媒体对其关注的广度与深度均持续上升。其关注焦点呈现出“由东向西”的历时动态变化的同时，报道态度也由初期的“疏离旁观”转变为近期的“质疑与合作”并存。对话语事件冲突中心的分析显示，“冲突化”是德国媒体传递质疑与批评声音的主要话语策略，并借此塑造了“雄心勃勃的中国”与“质疑忧虑却无应对之策的世界主要国家”的对比形象。鉴于中德经济互补性减弱、竞争性日增的社会背景，以及德国媒体将中国的和平崛起更多视作为“威胁”的话语背景，德国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话语的建构方式及认知一方面延续了其批判性写作文风，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其对中国崛起、欧洲将在全球新秩序中扮演何种角色的隐忧。

关 键 词：“一带一路”倡议； 中国形象； 德国媒体； 语料库批评话语分析

作者简介：同济大学 外国语学院 助理教授 上海 200092

中图分类号：H33

文献标识码：A

文 章 编 号：1005—4871(2019)02—0099—16

* 本文是同济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年来欧洲舆论的变化及我应对”(编号:22120180173)、同济大学一流学科建设——社会科学群子课题《中国特色文化思想对欧翻译传播及其影响研究》(编号:0703141302)的阶段性成果。

2013年9月与10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哈萨克斯坦与印度尼西亚期间,先后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合称“一带一路”倡议)。在过去五年中,“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受到了全球媒体的密切关注。鉴于媒体在舆论塑造、公共议程设定等方面有重要影响力,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与形象塑造也成为国内学术界的研究热点。迄今为止,学界已经对美国^①、加拿大^②、日本^③、巴基斯坦^④等世界主要国家以及“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的媒体中的“一带一路”相关报道,从议程设置、文本分析、内容分析、形象构建策略等各个视角进行了分析解读。其研究结果对系统分析把握外国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以及积极构建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在内的对外传播话语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德国作为中国在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北线在欧洲的终点区,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同样具有重要作用。随着“一带一路”倡议项目的落地实施,德国主流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关注度与关注视角呈现出显著的动态变化^⑤。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学界对德国主流媒体关于“一带一路”报道的议程设置特点、话语构建策略等尚未进行系统分析^⑥。鉴于德国媒体在舆论塑造,甚至是政策制定中的重要作用,对其进行系统性的研究是认识把握德国乃至欧盟对我国“一带一路”倡议认知态度的重要途径。本文以语料库批评话语分析为研究方法,通过分析归纳所采集报道的议程设置与话语事件的构建策略,呈现德国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构建模式以及由此投射出的认知特征,进而从宏观层面阐释剖析其产生的话语及社会背景原因,并提出应对建议。

一、研究方法 with 语料

本文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为“语料库批评话语分析法”。批评话语分析作为一种将话语分析与社会批评理论相结合的研究范式,于20世纪90年代确立了其在人

① 韦宗友:《美国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基于美国三大主流媒体的文本分析》,载《国际观察》,2018年第1期,第112—126页。

② 朱琼莉、邹萍:《加拿大主流媒体视野中的“一带一路”倡议解读——对〈环球邮报〉相关报道的内容分析》,载《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第81—88页。

③ 李雪威、赵连雪:《日本主流报刊媒体的“一带一路”报道变化分析——以〈日本经济新闻〉〈读卖新闻〉为例》,载《现代日本经济》,2018年第5期,第39—51页。

④ 曹然:《“一带一路”视域下中国形象媒体建构策略分析——以巴基斯坦主流英语报刊涉华报道为例》,载《苏州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第99—106页。

⑤ 李莎莎:《“一带一路”五年——德国媒体从“疏离旁观”到“喜忧参半”》,观察者网,2018-10-10, https://www.guancha.cn/lishasha/2018_10_10_474851_2.shtml,访问日期:2018-11-10。

⑥ 李智、李逸萌:《德国媒体的中国形象建构——以〈明镜周刊〉“一带一路”报道为例》,载《国际传播》,2018年第4期,第53—64页。

文社会学科中的研究地位^①。在过去三十年中,批评话语分析在国外学界得以快速发展并形成了诸多不同研究学派^②。该研究范式在德国主要是以西格弗里德·耶格尔(Siegfried Jäger)为代表的杜伊斯堡学派^③。其概念理论基础是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话语思想,分析焦点为揭示话语、知识、真相与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知识是通过话语(思考与言语)以及非话语(行为)实践产生并发挥作用的。在其获得具有绝对优势的真值权以后,则化身为社会真相。权力的实施即隐藏(隐性)或体现(显性)在此转换过程中^④。因此,作为知识的重要载体,话语并非仅仅反映社会真相,而是参与并影响社会真相的构建。批评话语分析旨在揭示在此构建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真相扭曲以及对真值权(权力)的争斗,并阐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原因^⑤。在研究方法层面,批评话语分析通常采用的是将话语结构分析与话语片段(文本)分析相结合的定性分析方法^⑥。关于具体的分析流程,学界已存在诸多分析方法^⑦。如耶格尔指出,对话语文本进行精度批评话语分析,可以从机构语境、文章表征、语言—修辞方法、内容—意识形态观点分析等各个角度切入,或者对其进行综合性分析^⑧。本研究将主要从话语表征的“冲突中心”角度对话语事件进行分析,以展示媒体在同一话语事件中呈现不同甚至互相矛盾的命题观点的话语方式,提炼媒体在话语事件中关注的焦点、报道视角以及借此所传递的对该事件的态度,并阐释其产生或存在的原因。

① 苗兴伟:《批评话语分析的新议程》(中文导读注释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页。

② 同上。

③ Claudia Bluhm/Dirk Deissler/Joachim Scharloth/Anja Stukenbrock, „Linguistische Diskursanalyse: Überblick, Probleme, Perspektiven“, *Sprache und Literatur in Wissenschaft und Unterricht*, No. 2, 2000, S. 3—9, hier S. 4.

④ Daniel Bartel/Peter Ullrich/Kornelia Ehrlich, „Kritische Diskursanalyse: Darstellung anhand der Analyse der Nahostberichterstattung linker Medien“, in Ulrike Freikamp/Matthias Leanza/Janne Mende/Stefan Müller/Peter Ullrich/Heinz-Jürgen Voß (Hrsg.), *Kritik mit Methode? Forschungsmethoden und Gesellschaftskritik*, Berlin: Dietz, 2008, S. 53—72, hier S. 54.

⑤ 辛斌:《批评语言学:理论与应用》,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版,第7—8页;Siegfried Jäger, *Kritische Diskursanalyse. Eine Einführung*, 7., überarb. Auflage, Münster: Unrast, 2015, S. 38—49.

⑥ Siegfried Jäger, *Kritische Diskursanalyse. Eine Einführung*, S. 90.

⑦ 钟馨:《英国全国性报纸中“一带一路”话语的意义构建研究》,载《现代传播》,2018年第7期,第61—69页,这里第62页;Reiner Keller, „Diskurse und Dispositive analysieren. Die Wissenssoziologische Diskursanalyse als Beitrag zu einer wissenschaftlichen Profilierung der Diskursforschung“, *Forum Qualitative Sozialforschung*, No. 2, 2007, <http://www.qualitative-research.net/index.php/fqs/article/view/243>, 访问日期:2018—11—19;Siegfried Jäger, *Kritische Diskursanalyse. Eine Einführung*, S. 90—91;Ekkehard Felder, „Pragma-semiotische Textarbeit und der hermeneutische Nutzen von Korpusanalysen für die linguistische Mediendiskursanalyse“, in Ekkehard Felder/Marcus Müller/Friedemann Vogel (Hrsg.), *Korpuspragmatik. Thematische Korpora als Basis diskurslinguistischer Analysen*, Berlin/New York: de Gruyter, 2012, S. 115—174, hier S. 134—137.

⑧ 同注⑥, S. 90—91.

定性话语分析方法的优点是能对所研究文本进行详尽深度分析,缺陷则是由于该类分析多通过人工阅读完成,文本数量通常较少,其分析结果常被质疑主观解读性过强,普适性、客观性与可信度较低^①。在此背景下,语料库批评话语分析应运而生:德国话语分析学者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尝试将语料库方法引入到(批评)话语分析领域中来^②,以弥补上述缺陷,为阐释定性的话语分析提供实证定量的数据支持,从而提高分析结果的客观性与可信度。现如今,伴随着语料库分析方法的飞速发展,使用语料库方法对话语数据进行解读,已经成为当下(批评)话语分析领域不可或缺的研究方法^③。语料库与(批评)话语分析的结合方法通常分为以下两类:基于语料库的(批评)话语分析方法以及语料库驱动(批评)话语分析方法。前者研究的出发点是定性话语分析,即在对典型话语数据进行定性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设或结论以后,采用语料库方法搜索例证(单词、短语、论证范式、隐喻等),以为该假设或结论提供语料证据,提升其客观可信度;后者则是以语料库数据为出发点,通过运用语料库方法(高频词、关键词、共现搭配、语言构式分布等)归纳提炼出所分析话语的典型语言使用模式与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设并对其进行批评话语分析,即阐释该语言特征构建的意义,并解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原因。在实际研究中通常会将上述两种方法结合或循环使用^④。

由于语料库方法与批评话语分析方法有着各自的缺陷:批评话语分析方法的缺陷是分析样本数量较低,致使分析结果缺乏客观性以及普遍性;语料库分析方法的缺点则是其分析局限在语言表层,无法提取抽象的语义、句法、文本以及话语关系。将两种方法相结合,能够克服各自方法的缺陷,实现优势互补、协同增效。故本文采取该理论方法展开研究,具体分析步骤如下:首先为本研究自建德国主流媒体^⑤关于“一带一路”倡议报道的话语语料库。该话语语料库的新闻文本来源于新闻数据库 LexisNexis,“南德意志报”以及“法兰克福汇报”三个数据库,共覆盖 11

① 钟馨:《英国全国性报纸中“一带一路”话语的意义构建研究》,第62页。

② Dietrich Busse/Wolfgang Teubert, „Ist Diskurs ein sprachwissenschaftliches Objekt? Zur Methodenfrage der historischen Semantik“, in Dietrich Busse/Wolfgang Teubert (Hrsg.), *Linguistische Diskursanalyse: neue Perspektiven*, Wiesbaden: Springer, 2013, S. 13–30, hier S. 16–18.

③ Noah Bubenhofer/Joachim Scharloth, „Korpuslinguistische Diskursanalyse. Der Nutzen empirisch-quantitativer Verfahren“, in Ingo H. Warnke/Ulrike Meinhof/Martin Reisigl (Hrsg.), *Diskurslinguistik im Spannungsfeld von Deskription und Kritik*, Berlin: Akademie-Verlag, 2013, S. 147–168, hier S. 147.

④ Noah Bubenhofer, *Sprachgebrauchsmuster. Korpuslinguistik als Methode der Diskurs- und Kulturanalyse*, Berlin, New York: de Gruyter, 2009, S. 102.

⑤ 本文对主流媒体的定义标准主要是其政治严肃性与发行量。所收集媒体皆为德国政治严肃、全国性、发行量(阅读量)大的纸质以及网络媒体。

家德国印刷以及网络媒体的新闻文本。这 11 家媒体分别为：《明镜》周刊、“明镜在线”、《时代》周报、“时代在线”、《世界报》《星期日世界报》《日报》《法兰克福汇报》《法兰克福评论报》《南德意志报》与德国广播电台。^① 检索词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德语译名“neue Seidenstraße(新丝绸之路)”^②，所设定检索时间段为 2013 年 9 月 10 日到 2018 年 7 月 18 日。经过对所检索结果进行相关性核对筛选，最后将 381 篇新闻文本纳入语料库，共包含 428 783 个形符。该 381 篇文章是指所有包含“neue Seidenstraße”这一表达的新闻文本。在此基础上，经过人工阅读筛选，提取到 82 篇对“一带一路”倡议的专题报道文章，总形符数为 84 379。该 82 篇文章构成本研究的专题语料库(简称“BRI 语料库”)。语料库构建完毕后，首先分析报道数量的变化过程，然后采用语料库驱动方法，提取 BRI 语料库的关键词及其历时变化，以提炼德国媒体“一带一路”报道的特征话语及话语事件^③。最后采用语料库批评话语方法对话语事件进行案例剖析，从“冲突中心”视角解析德国媒体构建话语事件的话语策略。

二、德国主流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认知的历时变化

本章节通过分析德国主流媒体“一带一路”报道的数量、关键词及关键词历时变化三个层面，呈现其关于“一带一路”倡议报道的议程设置特点以及报道焦点，进而宏观解读由此反映出的德国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

(一) 德国主流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报道数量的变化

如上文所述，通过语料库检索以及人工核实方法，本研究共收集到 381 篇包含“一带一路”字符的新闻文本。其逐年数量分布及变化如下表所示：

表 1 德国 11 家主流媒体提及“一带一路”倡议概念的报道数量逐年分布

	2013~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总计
《法兰克福汇报》	8	26	17	62	41	154
《世界报》	3	5	3	18	11	40
《法兰克福评论报》	2	5	4	11	10	32

① 其中《法兰克福汇报》以及《南德意志报》的新闻分别来源于其报社自建语料库“法兰克福汇报”与“南德意志报”。此外，德国广播电台不在上述三个数据库中，其专题文章是通过网站关键词搜索方式获取。还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新闻语料库 LexisNexis 没有公开其收录文章的具体标准，因此从该语料库检索到的新闻文本数量可能与实际数量有一定偏差。

② 作者通过抽取新闻样本阅读分析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在德国媒体中普遍被称作“neue Seidenstraße(新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倡议的字面德语翻译“ein Gürtel, eine Straße”或是其英译“One Belt One Road”在所抽取新闻样本中仅限于解释其为该倡议的字面翻译。

③ 媒体报道中的“话语事件”是指被多家媒体报道关注的、对其所属话语分支走向以及质量产生重要影响的事件。参见 Siegfried Jäger, *Kritische Diskursanalyse. Eine Einführung*, S. 82.

续表 1

	2013~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总计
《南德意志报》	0	0	0	16	13	29
“时代在线”	1	5	2	10	8	26
《日报》	2	5	1	8	6	22
“明镜在线”	1	2	1	6	11	21
《星期日世界报》	1	4	2	5	4	16
《明镜》周刊	0	0	3	5	7	15
《时代》周报	1	0	0	9	4	14
德国广播电台	2	4	0	2	1	9
总计	21	56	33	152	116	378

来源:作者自制。

如表 1 所示,各媒体文章提及“一带一路”倡议报道的数量差异较大,其中《法兰克福汇报》相关文本数量最多^①。然而,尽管数量差异较大,其数量变化走势却非常相似:2013~2014 年度文章数量最少,经过 2015~2016 年缓慢增长阶段,迎来了 2017 年相关报道数量的井喷式增长(152 篇)。进一步分析发现,这主要与 2017 年 5 月份“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举办以及“一带一路”项目逐步落地有关。2018 年度相关报道仅收录到 2018 年 7 月 18 日,然而其数量(116 篇)已经超过了 2013 到 2016 年报道数量之和(110 篇)。2018 年的月平均报道数量也已经超过 2017 年,由此预测 2018 年与“一带一路”相关的报道数量总数可能会超过 2017 年。综上所述,“一带一路”这一概念被德国主流媒体提及的年度总数量以及月平均数量在过去五年中持续上升。鉴于大众媒体的传播作用可做出推论:“‘一带一路’倡议”这一概念在德国大众中的熟知度或呈现持续攀升的态势。

德国媒体提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报道数量反映的是该倡议传播的广度。研究德国媒体对该倡议报道的深度以及报道视角,需要深入分析专题报道的数量与内容。本研究自建的 BRI 语料库所收集的专题报道呈现如下逐年分布:

表 2 德国 11 家主流媒体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专题报道逐年分布

	2013~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总计
《法兰克福汇报》	2	4	4	18	7	35
《世界报》	0	1	0	3	2	6
《南德意志报》	0	0	0	2	2	4

^① 这可能与《法兰克福汇报》的文章来源于其自建语料库“法兰克福汇报”有关。LexisNexis 检索标准不透明,可能会出现文章遗漏缺失。各报纸之间报道数量的差异并非本文研究重点,因此该数据差异对本文研究结果影响较小。

续表 2

	2013~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总计
《法兰克福评论报》	0	2	0	3	3	8
“时代在线”	0	1	0	1	2	4
《时代》周报	0	0	0	1	0	1
《日报》	0	0	0	6	1	7
“明镜在线”	0	2	0	1	3	6
《明镜》周刊	0	0	2	0	1	3
《星期日世界报》	0	1	0	0	0	1
德国广播电台	1	3	0	2	1	7
总计	3	14	6	37	22	82

来源：作者自制。

在报道数量变化趋势方面，表 2 与表 1 非常相似：不同媒体专题报道的数量差异显著，其中《法兰克福汇报》对“一带一路”倡议专题报道的数量依然位列第一。从年度总体专题报道数量来看，2014 年到 2016 年整体较低（分别为 3、14、6 篇），2017 年同样呈现井喷增长趋势（37 篇）。2018 年的月平均专题报道数量（3.14 篇）相较 2017 年（3.08 篇）小幅度增长。综合表 1、表 2 所展示的数据可得出结论，德国主流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关注的广度与深度在过去五年中整体呈现持续上涨的态势。

表 1、表 2 呈现的是报道数量年度变化趋势。如上文所述，初步分析发现，报道数量以及关注度的变化与相关重要事件，如“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举办等，密切相关。为验证该假设，本文进一步对专题报道的月份数量进行了分析，获得以下图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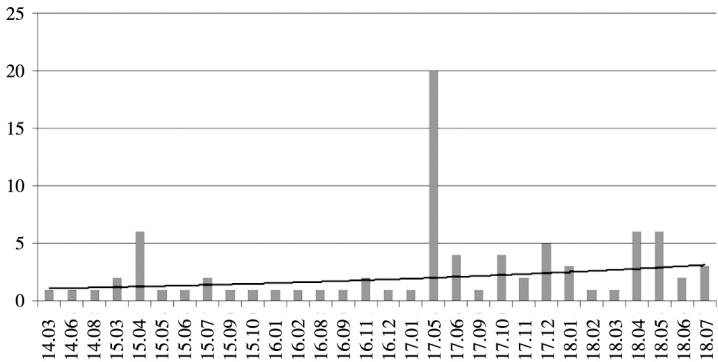


图 1 德国 11 家主流媒体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专题报道逐月分布

来源：作者自制。

由图1可以看出,专题报道不同月份的数量呈现出显著差异。其分布趋势的几个高峰数值(2015年4月、2017年5月等)表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重要事件的发生对媒体关注度有重要影响:2014年3月到2017年4月专题报道的唯一高峰出现在2015年4月,这与该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的成立相关。此后一段时间德国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专题报道力度较低,直至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举办,专题报道数量在该月到达绝对高峰值。尽管之后关注度有所回落,月平均报道值(3.87篇)已远远超过了高峰论坛举办之前的数量(0.52篇)。图中指数增长曲线同样证明,德国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关注度持续上升^①。

德国主流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关注度持续上升的同时,其关注的焦点与视角是否也呈现出动态变化,以及如何变化?下文将采用语料库关键词提取分析及可视化方法,呈现并解析德国媒体“一带一路”倡议报道的关注焦点及其动态变化过程。

(二)德国主流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专题报道的关键词及其动态变化

关键词分析是借助参照语料库进行统计分析的定量分析方法^②。该方法是有针对性地提取特定话语特征词汇的重要语料库工具。在(批评)话语分析中,通过提取分析关键词能够挖掘该话语的特征词汇。在将其进行归纳提炼后,则可获取相应的话语事件以及话语子主题。尤其是在话语样本数量较大情况下,关键词分析能够呈现跨语篇及超语篇的话语信息,从而为话语分析者提供话语主题结构线索^③,这是传统定性(批评)话语分析所不可及的。在此基础上应用可视化处理方法能够一目了然地展现出关键词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提取关键词所用参照语料库是“Timestamped German corpus(2014—2018)”语料库^④。该语料库动态抓取2014年至今的众多德语媒体网站的新闻报道,包含3 504 166 511个字符(2018年9月)。作为媒体话语的大型综合语料库,其在均衡性以及代表性方面均非常适合做本研究的参照语料库。检索分析所获取BRI语料库关键词发现,前一百个关键词可被划分为与“一带一路”相关的人物、属性、机构以及地区四大类别,如下方词汇云图所示:

① 图中的曲线是在将月专题报道数量做成图表之后,由EXCEL表格自动生成的指数增长曲线。

② 关键词分析过程中,形符的绝对频率并非其关键参数,形符在所分析语料库中的频率与参照语料库中频率的关系决定所获关键词列表。因此参照语料库的均衡代表性对分析关键词有重要影响。参见:Noah Bubenhofer, „Quantitativ informierte qualitative Diskursanalyse“, in Kersten Sven Roth/Carmen Spiegel (Hrsg.), *Angewandte Diskursanalyse. Felder, Probleme, Perspektiven*, Berlin: Akademie-Verlag, 2013, S. 109—134, hier S. 110.

③ Alexander Ziem, „Wortschatz II: quantifizierende Analyseverfahren“, in Kersten Sven Roth/Martin Wengeler/Alexander Ziem (Hrsg.), *Handbuch Sprache in Politik und Gesellschaft*, Berlin, New York: de Gruyter, 2017, S. 47—68, hier S. 55.

④ 参见 <https://www.sketchengine.eu/timestamped-german-corpus/>, 访问日期:2018—08—20。



图2 BRI 语料库关键词词云

来源：作者自制。

词汇云图中关键词字体的大小代表其关键性得分：字体越大，其关键度越高，表明该词对自建 BRI 语料库特征词汇的代表度越高。左上角云图展示的是关键人物：其中最能代表 BRI 语料库的人物是中国（国家领导）人。此外，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德国经济部长齐普里斯（Zypries）与德国杜伊斯堡港口集团董事会主席史塔克（Staake）均位列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Nasarbajew）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特征人物。上述代表人物与右上角的代表地区相互吻合：关键地区（右上角）主要为中国（北京）、中亚、哈萨克斯坦。杜伊斯堡也位列关键地区之中。此外，前一百个关键词中涉及地区的词汇明显比人物词汇多：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Piräus）、中国诸多城市（如义乌、新疆、重庆以及武汉等）、巴基斯坦、斯里兰卡以及欧亚大陆等地区词汇亦位列其中。由此可看出，德国媒体在其“一带一路”倡议话语中对该倡议所涉及的地域给予了较大关注。左下角云图呈现的是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机构。右下角云图包含了与“一带一路”倡议属性相关的关键词：其中最显著的关键词是贸易路线（Handelsroute、Handelsweg）以及基建项目（Infrastrukturprojekt）。在所有的基建项目（铁路、港口、石油天然气管道等）中，最醒目的是与铁路货运相关的词汇，如货运列车（Güterzug）以及铁路线（Eisenbahn、Eisenbahnlinie、Eisenbahnstrecke、Zugverbindung、Railway）等。此外，地缘政治（geopolitisch）、产能过

剩(Überkapazität)、国有企业(Staatsunternehmen)、全球化(Globalisierung)、经济大国(Wirtschaftsmacht)等词也位列该属性类别之中。分析相关词条可看出,德国主流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基建、贸易、经济属性给予高度关注的同时,也对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地缘政治目的进行了诸多揣测与解读。

通过提炼归纳 BRI 语料库的关键词,获取 BRI 语料库的特征词汇,可以快速了解德国媒体关于“一带一路”倡议报道的概貌特征。对关键词词条进行进一步分析发现,不同关键词的年度分布差异较大。从该差异分布可推论出,2013 年到 2018 年相关报道的焦点呈现出历时动态变化。为具体研究该变化趋势,本研究将 BRI 语料库按年份进一步切割为三个子语料库:2013~2016 年,2017 年以及 2018 年语料库,并以 BRI 语料库作为参照语料库,分别对三个子语料库进行了关键词提取,结果如下:



图3 BRI 三个子语料库关键词词云

来源:作者自制。

如图3所示,以BRI为参照语料库的三个子语料库提炼出完全不同的关键词。该关键词的差异反映出,从2013年到2018年(7月份)德国主流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报道焦点发生了显著变化:2013年到2016年,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之前,相关报道的关注焦点相对集中在中国西部地区、中亚与南亚邻国等。除相关地域名称外,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以及美方反应)及中巴走廊(Wirtschafskorridor)的成立均是该年度的关键词汇。2017年报道关注的焦点有所分散:“会议(Konferenz)”,德国经济部长的名字(Zypries),东南欧多个国家、首都以及领导人的名字(Südeuropa、Georgien、Budapest、Serbien、Orbán等)均为本年度关键词。通过分析关键词具体词条可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与“16+1”论坛举办为该年度的话语事件。2018年云图显示,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以及中法“一带一路”的合作计划、美国全球发展中心关于“一带一路”债务问题的报告均位列关键词之中,成为当年话语事件。此外,“杜伊斯堡港口集团(Duisburger)”“杜伊斯堡(Duisburg)”“武汉(Wuhan)”“杜伊斯堡港口集团董事会主席史塔克(Staake)”等关键词显示,与其他年度相比,德国内陆港口城市杜伊斯堡通过“渝新

欧”铁路线积极参与到“一带一路”倡议的案例也成功成为2018年德国媒体关注的话语事件。

借助对子语料库提取关键词的方法能够重塑并呈现德国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关注焦点的历时动态变化过程,并借以提炼历时话语事件。对不同话语事件的相关文章阅读分析发现,德国媒体对不同话语事件的报道,在报道视角、措辞以及态度等方面均不尽相同。如上文所述,本研究将主要从话语表征的“冲突中心”角度切入,对话语事件进行分析,以展示媒体在同一话语事件中呈现不同甚至互相矛盾的命题观点的话语方式,提炼媒体在话语事件中关注的焦点、报道视角以及借此所传递的对该事件的态度。

三、BRI 语料库话语事件的“冲突中心”分析

同一话语主题或者话语事件多数是由多个不同社会参与者共同构建。而话语参与者对相同事件往往持有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观点。话语“冲突中心”正是此类观点之间争夺“真值权”以及“阐释权”在语言表层的体现^①。冲突中心的主要作用是在展示两个不同或相左观点的同时,将读者的注意力聚焦到二者之一(多为后者),从而达到突出强调该观点的语用效果^②。因此,媒体通过构建话语冲突中心,一方面能够展示不同话语参与者的立场,塑造其客观中立的形象,另一方面也直接或间接借他人观点传递其对某话语事件的视角与态度。此外,冲突中心并非静态存在的,而是处于动态转化之中,是话语事件的不同命题在不同话语片段中持续博弈的结果。在语言表征方面,“冲突中心”是对具体冲突点归纳提炼而得出的抽象层级的概念,“冲突点”的构造则主要通过连词、副词、介词(转折类、让步类、替代类)、名词、动词(冲突、斗争、矛盾类)等各类词汇得以实现^③。本文“冲突中心”是围绕某个特定主体展开,如中国、欧洲、俄罗斯等。在冲突中心基础上概括抽象所得的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的冲突性,本文称之为“冲突关系”。

在话语篇章数量较大的情况下,通常运用语料库共现搭配的定量分析方法,分析语料库中与上述词汇高频共现的搭配词,并将其总结提炼为话语的冲突中心^④。本研究作为话语事件案例分析,话语样本数量较低,因此采用高频搭配共现与人工

① Ekkehard Felder, „Pragma-semiotische Textarbeit und der hermeneutische Nutzen von Korpusanalysen für die linguistische Mediendiskursanalyse“, S. 137.

② Gisela Zifonun, *Grammatik der deutschen Sprache*, Berlin,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1997, S. 2403.

③ Evi Sheldl, „Korpuslinguistische Zugänge zu Agonalen Zentren“, <https://archiv.ub.uni-heidelberg.de/volltextserver/22823/>, 访问日期:2018-10-12.

④ 此方法适用于提取大型语料库的冲突中心。然而该方法无法确定两种相左观点中,哪一个观点是被突出强调的,或者哪一个观点是被修改的。为了获取该类研究结果,需对词条进行阅读分析。

词条阅读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提炼归纳德国媒体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召开这一话语事件中制造的冲突中心^①,在此基础上呈现并阐释德国主流媒体叙述话语事件的话语策略。

如上文对 BRI 数据库的宏观议程设置分析所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以下简称“带路峰会”)的召开可视为德国主流媒体过去五年关于“一带一路”倡议报道的主要话语事件。BRI 数据库包含 18 篇与“带路峰会”相关的报道,共有 97 个冲突点。以其主体为标准,可将其冲突点划分为以中国(52)、欧洲与德国(13)、俄罗斯(9)、印度(9)、美国(6)以及亚洲其他邻国(8)为主体的“冲突中心”,具体如下:

表 3 德国媒体在话语事件“带路峰会”中构造的“冲突中心”

	命题一	“转折”	命题二
中国	1) 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内进行巨额投资	⇔	1. 1) 因贷款苛刻引发争议批评 1. 2) 某些项目出现质量问题 1. 3) 项目多由中国企业主导 1. 4) 存在浪费现象 1. 5) 面临融资问题
	2) 中国企业在全球投资		2. 1) 外国企业在中国面临市场准入困难
	3) 中国倡导全球化		3. 1) 西方担心中国主导全球化 3. 2) 全球化仅对中国企业而言
	4) “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实现“双赢”		4. 1) 中国可能赢最多 4. 2) 使其他小国家陷入依附关系
	5) 中国想要借此成为世界贸易中心		5. 1) 离销售市场(欧洲)太远 5. 2) 其他沿线国家参与数量与力度还太少
	6) 在中亚、阿富汗等地投资可能有助于打击恐怖主义		6. 1) 较难实现
	7) “一带一路”基建项目大多由中国企业主导		7. 1) 沿线国家也从中获益 7. 2) 沿线国家需要中国的基建技术

① 本研究主要参照 Ekkehard Felder, „Pragma-semiotische Textarbeit und der hermeneutische Nutzen von Korpusanalysen für die linguistische Mediendiskursanalyse“, S. 154 对转折、让步类,参照 Evi Sheldl, „Korpuslinguistische Zugänge zu Agonalen Zentren“, S. 17, S. 25 对替代类词汇的词条进行了其冲突中心构造分析。具体检索分析单词如下:1) 转折类:zum einen, wohingegen, wogegen, wiederum, wieder, während, nur dass, nur, mal, jedoch, indessen, indes, hinwiderum, hinwieder, hingegen, halb, freilich, einmal, einesteils, einerseits, doch, derweil(en), demgegenüber, dementgegen, dahingegen, dagegen, dafür, bloß dass, bald, andererseits, andernteils, allerdings, allein, alldieweil, aber. 2) 让步类:wobei, wo, wiewohl, wider, wennzwar, wennschon, wenngleich, wenn, ungeachtet, dass, ungeachtet dessen, unbeschadet dessen, trotzdem, trotz, sosehr, obzwar, obwohl, obschon, obgleich, nichtsdestoweniger, nichtsdestotrotz, nichtsdestominder, gleichwohl, entgegen, dessen ungeachtet, des ungeachtet, dennoch, dafür dass, dabei. 3) 替代类:anstatt, anstatt dass, anstatt dessen, anstelle dessen, statt, statt dass, stattdessen, sondern.

续表 3

	命题一	“转折”	命题二
欧盟 & 德国	许多国家领导人参加峰会	⇔	德国总理默克尔未出席,经济部长代为出席
	欧盟(德国)对“一带一路”倡议持怀疑态度		欧盟无有效应对策略
	欧洲有观察者为“一带一路”持积极态度		“一带一路”倡议框架内无明确规则,多为双边规则或临时规则
俄罗斯	普京出席峰会		俄罗斯心存疑虑
	对“一带一路”倡议心存质疑		俄罗斯需要与中国结盟
印度	许多国家领导人参加峰会		印度拒绝参加
	印度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对其构成威胁		印度无有效应对策略
美国	美国之前声明不参加峰会		美国派代表团参加峰会
	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实行保护主义		美国曾经主导全球化
亚洲其他邻国	年轻人对“一带一路”倡议持积极好奇的态度		亚洲邻国担心中国势力过大
	在这些国家可能产生新的经济中心		需要较长时间
	民众能够从项目中受益		这些国家精英政客获益更大

来源:作者自制。

如表 3 所示,德国媒体围绕“带路峰会”构建了以不同主体为出发点的多种冲突中心。以中国为主体的冲突中心数量最多,共有七组,其中第一组最为醒目。其基本论述框架可提炼为:德国媒体指出中国政府以及企业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内在沿线国家进行巨额投资,这构成冲突中心左侧命题,即命题一。“投资”通常意味着能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因此是一个隐性积极命题。然而,在所有相关新闻文本中,作者均未对该隐性积极命题展开论述,而是话锋一转,将读者的焦点引导到投资(可能)带来的问题上:贷款条件苛刻、质量问题、浪费问题、双边条件不对等等(可能存在的)问题构成了与“巨额投资”这一隐性积极命题相对比的冲突中心。该冲突中心的建立显示,“一带一路”倡议的投资规模令德国媒体印象深刻,因此“巨额投资”这一表述出现在多篇文本中。德国媒体通过构造“冲突中心”,将其表述重点置于该倡议投资(可能)存在的问题上。进一步分析发现,德国媒体在对其提及的“问题”进行论证时,论证模式多为列举个例法。如《法兰克福汇报》2017 年 5 月 10 日《亚洲国家对承诺的怀疑加重》一文在介绍中国在马来西亚投资的项目及金额后指出:“……(项目)经常出现质量缺陷。中国在新几内亚岛上建造了一个巨型会议中心。但是由于其未建造合适的厨房,明年在太平洋国家峰会时可能无法使用。”用一个案例作为论据得出“经常”出现项目质量问题的“普适性”结论,这种论证的方式的可信度较低。针对中国提出的“双赢”、倡导的“全球化”等理念,德国媒体采用类似论证方法提出质疑。总体说来,德国媒体通过构造以中国为主体的冲突中

心,将读者焦点引导到其眼中的问题之上,传递的是质疑批判的态度,塑造的是“意欲借此成为世界超级经济大国”的中国形象。

通过构造以欧洲 & 德国为主体的冲突中心,德国媒体塑造了“质疑焦虑的欧洲”形象:尽管诸国国家首脑均莅临峰会,德国总理默克尔并未出席,而且欧洲代表国家没有签署联合公报。此两种举动均表明,包括德国在内的欧盟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持怀疑态度。在此基础上,德国媒体塑造的冲突中心是质疑却无应对之策,强调欧洲迄今无法提出与“一带一路”倡议相抗衡的计划。以俄罗斯为主体的冲突中心展现的则是“进退两难的俄罗斯”的形象:俄罗斯对“一带一路”倡议同样心存疑虑,然而由于欧美的经济制裁,俄罗斯亟需与中国结盟,因此主动参与到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来。德国媒体通过冲突中心塑造的印度的态度则是视“一带一路”倡议为对自己的威胁,拒绝参加“一带一路”峰会,然而其亦没有能力提出有效应对策略。与美国相关的冲突中心是美国宣称不参加峰会与派代表团参加峰会这一转变,德国媒体将其视作中国外交的胜利。此外,“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推行贸易保护主义”与“美国曾经倡导全球化”这一对比也成为一组冲突中心。以亚洲邻国为主体也构成了几组不同的冲突中心:这些国家的年轻人大多积极看待“一带一路”项目,然而这些国家同时担心中国实力过于强大。另外,“与民众从‘一带一路’倡议中获益相比,这些国家的政客精英可能获利更大”也是德国媒体构造的与亚洲邻国相关的冲突中心。

表3 所列举的冲突中心是将在词汇层面表达的具体冲突点进行第一层级抽象提炼所得。将上述冲突中心从“冲突主体之间的关系”的视角进行第二层级抽象归纳,可提炼出德国媒体在“带路峰会”话语事件中构建的两种冲突关系:第一种是“中国”与“世界其他主要国家”的关系:中国意图或可能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发展成为世界超级经济大国,世界其他主要国家(欧洲、俄罗斯、印度等)对此表示质疑与忧虑的同时,迄今无法提出应对之策。第二种关系是“中国”与“倡议沿线邻国”之间的冲突关系:尽管倡议沿线邻国对该倡议普遍持积极的态度,然而它们同时担忧中国影响势力过大。通过整合上述两种冲突关系,进一步进行第三层级抽象归纳,可得出结论:德国主流媒体在“带路峰会”这一话语事件中采取“冲突化”策略,将“中国(通过‘一带一路’))的发展”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对立起来,由此间接传达出“中国威胁论”的论调。

四、结 语

本文结合语料库与批评话语分析方法,自建专题语料库,对11家德国主流媒体过去五年(2013年9月到2018年7月)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报道尤其是专题报道进行了语料库批评话语分析,旨在呈现德国媒体对该倡议的议程设置特点,展现

其关注的焦点、报道的视角与态度,从而把握德国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

首先,德国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关注度与关注焦点均呈动态变化。一方面(专题)报道数量呈上升趋势,反映了德国媒体对该倡议的关注度持续增加;另一方面报道关注的焦点呈现明显“由东向西”转变:由倡议初始阶段对亚洲区域的报道转向近期对倡议相关项目在欧洲落地实施的密切关注。与之相对应的是报道态度的转变:倡议初期相关文章的基调多为疏离旁观,内容为介绍“一带一路”倡议的规划以及亚洲邻国对该倡议的反应,欧盟(德国)多以旁观者身份出现其中。而近期与欧洲相关的报道呈现出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与立场:既有对中国在东南欧的投资会损害西欧的利益甚至欧洲的团结的质疑与警告,以及对欧洲至今无法制定与“一带一路”倡议相抗衡的策略的忧虑;也有对欧洲企业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的项目以切实获益的希望,以及呼吁更多的欧洲企业加入“一带一路”项目中,拓展与中国在第三方市场的合作。然而,后者报道数量显著低于前者。

其次,通过分析2017年“带路峰会”话语事件冲突中心,本文揭示了德国媒体传递质疑与批评声的话语模式:通过构造冲突中心的“冲突化”策略,德国媒体将其表述重点置于对“一带一路”倡议可行性的质疑以及对伴随着投资或项目实施可能产生的问题的批判之上,鲜少提及“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的投资基建给当地带来的积极影响以及蕴含的发展潜力。尽管德国媒体标榜客观公正,在报道中也展示了不同话语参与者的观点或结论,然而这样的报道模式具有明显倾向性,有失偏颇。除此之外,通过构建冲突中心,德国媒体塑造了“雄心勃勃的中国”与“质疑忧虑以及无应对之策的世界主要国家”以及“积极期待倡议同时存在隐忧的倡议沿线国家”的冲突关系。尤其是“崛起的中国”与“衰弱的欧洲”这一冲突关系在峰会之后的相关报道,特别是在关于中国在欧洲的投资以及“16+1”合作的报道中,被德国媒体反复使用,借以呼吁德国政府与欧盟制定应对策略^①。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如上所述,“一带一路”倡议话语亦包含以传递希望与合作为侧重点的冲突中心,2018年“杜伊斯堡港口城市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这一话语事件即为该类冲突中心的典型代表。这种异质“冲突中心”共存的现象反映了话语冲突中心的多元性、可塑性以及处于持续动态博弈进程的特征。^②

综上所述,德国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与态度呈现出复杂化与矛盾化

^① 欧盟近期发布的《连接欧洲和亚洲——对欧盟战略的设想》(2018年9月19日)以及《欧中战略前景》(2019年3月12日)两份文件均可看作对该类呼吁的回应。

^② 笔者对德国媒体关于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2019年4月27日)相关报道进行初步分析发现,德媒构建的关于新一届高峰论坛的冲突中心部分与本文结果相吻合,部分发生迁移。这进一步证明话语冲突中心具有连续性及多变性的双重特征。对德媒构建的关于第二届带路高峰论坛的冲突中心的具体特征,尚需进行系统研究。

的特点,可概括为“质疑 & 焦虑与希望 & 合作”并存。^① 从中折射出其对中国发展的复杂认知与情感:一方面德国媒体仍然囿于冷战时期的“对立”以及“欧强中弱”的思维模式,将中国的发展崛起视作对西方发展模式以及西方经济的威胁;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对其又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希望欧洲包括德国能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中获益。鉴于德国媒体在舆论塑造以及政策制定方面的影响力,本文提出应对建议如下:首先,秉持“一带一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核心丝路精神,在尊重德国媒体批判性写作文风的同时,继续关注且系统分析其指出的相关问题。在核查此类问题是否属实后,或主动提出问题解决方案,或根据事实证据给予有力回应,以及时消除误解,扭转话语走向,掌握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构建权。第二,积极利用冲突中心可塑性的特质,以其“抱有希望、期待合作”的态度为出发点,以成功合作项目为范例,寻求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欧盟“欧亚互联互通”计划的对接点,共同打造优质合作项目,强化共建共赢合作模式,以积极创造共赢的国际舆论,减弱或消弭其对中国发展的质疑与担忧。第三,加强中德媒体的沟通交流,提升国内(德语)新闻网站对德传播影响力。报道视角的偏差多源于认识上的缺失,因此建议相关部门与机构积极打造交流平台,推动国内(德语)媒体与德国本土媒体的交流沟通,促使德国媒体反思其报道模式,在相关报道中更多纳入中国视角,传递塑造更加客观全面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中国形象,这亦符合媒体的基本行业准则。

责任编辑:郑春荣

^① 如上文所述,德国媒体的报道视角及态度,在本文所分析语料时间段2013年9月至2018年7月内,发生了显著变化。故此结论对于德媒后续涉华报道的适用性,如关于第二届“一带一路”峰会的报道,须通过进一步实证话语分析进行验证。

im Fall eines negativen Überprüfungsbeschlusses geraten, zuerst fristgemäß Einspruch zu erheben und ggf. die Rechtmäßigkeit der Maßnahmen gegen Umgehung gerichtlich überprüfen zu lassen. Langfristig sollen die Unterzeichnung des Investitionsabkommens zwischen der EU und China und der Aufbau des chinesischen Überprüfungsmechanismus für ausländische Investitionen nach dem Grundsatz der Reziprozität vorangetrieben werden.

Die Verwendung der rechtswidrigen Beweismittel im deutschen Zivilprozess und ihre Denkanstöße: den „Dashcam-Fall“ als Einstiegspunkt

Wu Yiyue

Rechtswidrige Beweismittel sind im Zivilprozess immer umstritten. Auf der Grundlage der Theorie der Interessenabwägung zeigt sich im deutschen "Dashcam-Fall", dass "die Rechtswidrigkeit einer Beweiserhebung im Zivilprozess nicht ohne Weiteres zu einem Beweisverwertungsverbot führt". Vielmehr ist "aufgrund einer Interessenabwägung nach den im Einzelfall gegebenen Umständen zu entscheiden". Diesem Standpunkt zufolge sollten die Interessen aller Beteiligten nach dem Prinzip der Verhältnismäßigkeit und dem Schutzzweck der Rechtsnormen ermessen werden. Wenn sich das Interesse des Beweisführers überwiegt, können die rechtswidrigen Beweismittel immer noch als Grundlage für die Ermittlung des Sachverhalts herangezogen werden. Im Vergleich zu der Handlungsweise des chinesischen Obersten Volksgerichts, nach der rechtswidrige Beweismittel über normative Dokumente ausgeschlossen worden sind, erweist sich der deutsche Ansatz als praktikabler. Dadurch wird nicht nur die Ausübung der Rechte der Parteien und die effektive Entwicklung des Zivilprozesses gefördert, sondern auch die Verwirklichung materieller Gerechtigkeit.

Die deutschen Berichterstattungen zur chinesischen „Belt & Road Initiative“: eine datenbankunterstützte Kritische Diskursanalyse

Li Shasha

In den letzten fünf Jahren verfolgen die deutschen Medien die chinesische "Belt & Road Initiative" (BRI) mit steigender Aufmerksamkeit. Der Fokus des Mediendiskurses zeichnet sich dabei durch eine diachronische Verlagerung von "Osten (Asien) nach Westen (Europa)" aus. Entsprechend hat sich die Haltung der deutschen Medien zur BRI von "abwartend" in der Anfangsphase zu einer Mischung von "Zweifel und Kooperation" in den letzten zwei Jahren geändert. Die Analyse der agonalen Zentren im Diskursereignis "Gipfel der BRI" zeigt, dass sich die deutschen Medien der Konfliktkonzeptualisierung bedienen, um Skepsis und Kritik zu kommunizieren. In der Kontrastierung zwischen einem "ehrgeizigen China" und "anderen großen Ländern der Welt, die skeptisch sind, jedoch keine eigene Strategie haben", spiegelt sich auch diese Argumentation wider. Mit der Ablösung der wirtschaftlichen Komplementarität durch zunehmenden Wettbewerb zwischen China und Deutschland wird Chinas friedlicher Aufstieg eher als "Drohung" dargestellt. Vor diesem sozialen und diskursiven Hintergrund versuchen die deutschen Medien in ihren BRI-Berichterstattungen einerseits ihr kritisches Medienbewusstsein aufrechtzuerhalten und andererseits ihre Sorge um Chinas Aufstieg und Europas Rolle in der neuen Weltordnung zu vermitteln.